

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论丛



主 编:程恩富

执行主编:王朝科 马艳 龚晓莺

Marxist Economics and
Innovation of Applied Economics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与 应用经济学创新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论丛



主 编:程恩富

执行主编:王朝科 马艳 龚晓莺

马克思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它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思想，以实践为基础，以阶级斗争为动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研究对象，探讨经济规律，揭示经济现象，提出经济理论，指导经济实践。马克思经济学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而且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广泛的现实意义。它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Marxist Economics and
Innovation of Applied Economics

马克思经济学
与应用经济学创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创新/程恩富主编。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7

ISBN 978-7-5096-0669-8

I. 马… II. 程…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4191 号

出版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电话：(010) 51915602 邮编：100038

印刷：北京晨旭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组稿编辑：王光艳

责任编辑：王光艳 宋 娜

技术编辑：杨国强

责任校对：超 凡

787mm×1092mm/16

22 印张 508 千字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8.00 元

书号：ISBN 978-7-5096-0669-8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010)68022974 邮编：100836

序

200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上海财经大学和贵州大学共同主办首届主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创新”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主题得到与会中外经济学家的一致认同和高度评价。

每当世界经济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全球化浪潮、亚洲金融危机乃至时下由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等等），马克思的理论在欧美、在全球一再走出书斋，让那些反马克思的、怀疑马克思思想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他们纷纷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去寻找现实经济问题的答案。观察一种思想是否具有生命力，一是看其是否与现实历史的发展相吻合，二是看其是否能够对社会发展方向产生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固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它对社会经济发展历史的预见性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影响力，是任何其他的理论都无法相提并论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是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取得的。我们完全可以说，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建设的成就，就不可能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模式。即便如此，也还是有很多学者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革命的、破坏旧世界的经济学，而不是建设世界的经济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去马克思化”的倾向愈演愈烈，西方经济学主流化的声音甚嚣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被边缘化；有的人甚至错误地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在我国成功运用的典范，有些经济学家公然主张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了社会主义失败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时论的证据。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与现实世界的发展存在差距，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能力，这是必须要正视的事实。我国应用经济学的一些学科自觉或不自觉地脱离了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不加甄别地直接照抄照搬现代西方应用经济学的论著，缺乏学术原创，处于学术“被殖民”或“学术搬运工”的状态。这有悖于中央倡导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精神，因此，有必要加强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引领应用经济学的创新，夯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地位的根基，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抱怨、忧虑、喊口号和不作为的层面上。

在传统意义上，人们习惯于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义语，将两者完全等同起来，这种认识的危害性表现在：人为地割断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与其他应用学科之间的逻辑联系，实际上就是主动放弃了对应用经济学科的指导，客观上为“学术殖民”提供了条件、为“学术搬运工”们提供了行动空间，更不用说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了。西方经济学固然有许多值得批判的地方，但是也有值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借鉴的地方。比如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为核心，以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发展经济学、国际金融学、国际投资学、产业组织学等为依托的学科体系。所以，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应用经济学两个层次在内的完善学科体系。

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元理论还缺乏系统的、共识性的成果，加之不同的应用经济学也可各有其自身的特质，所以在这里我们只能原则性地提出一种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的逻辑路径，我们将其概括为：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元理论，结合不同应用经济学的特质（研究对象和最终要达到的目的），确定元理论与应用经济学特质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构建该应用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和分析范式，进行应用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的逻辑展开，从而实现对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科学解释，提出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政策建议。

从整个经济学（包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演化过程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应用经济学学科都是从政治经济学这门基础性学科中衍生出来的，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它们原本理论相通、理论分层相关、分析方法相连、政策应用相通，因而才有经济学一、二、三级学科和研究方向的内在联系和差别。现在提倡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以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交叉融合，这说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除了方法上的相互借鉴外，客观上也存在着共通的元理论，这是交叉与融合的基础。既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都能够交叉与融合，难道经济科学内部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反而要人为地割断它们的联系、断绝其学术上的渊源关系吗？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蕴藏着非常丰富的思想和科学价值，而应用经济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有各自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要实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并指导应用经济学创新，关键是要实现下列三个方面的结合：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元理论与具体的应用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结合，并将这种结合通过统一的逻辑主线贯穿到整个学科的全过程；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元理论与以具体的应用经济学学科的起始范畴和核心范畴为基础构成的多层次的概念体系相结合；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元理论要与具体的应用经济学学科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从而能够将现实经济问题归入一个规范、科学的分析框架中，并能形成有效结论，用以解决和指导社会经济实践。

今年8月，我们将在内蒙古财经学院召开“第二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创新学术研讨会”，希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应用经济学家加强合作、交流，以传承、弘扬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为己任，推动整个经济学科的繁荣和发展，促进中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程恩富

2009年6月4日

目 录

总 论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 / 3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对程恩富教授“四大理论假设”的思考 / 19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演进与变革趋向 / 22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及其创新 / 30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争论与重构 / 38

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

- 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经济学 / 63
国际直接投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 / 70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时代性与实践性——兼论中国开放型经济 / 77
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与国际金融危机 / 85

马克思主义国民经济学

- 试论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国民经济学 / 95
GDPW——衡量科学发展的经济价值新标尺 / 102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基础 / 114
马克思的地域分工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 119
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一个现代阐释 / 127

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 中国实行“一胎化”生育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 / 137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环境生产力论探析 / 150
自然资源价值论 / 156
对循环经济研究的理论思考——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 / 162
基于二元价值论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概念框架 / 172

马克思主义劳动经济学

- 构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劳动经济学 / 181
马克思主义劳资关系理论与当代社会 / 186
从资本属性看劳资关系的平等性和公平性 / 197
劳资关系：当前的特点与未来变化的前景 / 206

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

- 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及对中国若干农业问题认识的启示 / 213
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的分析——基于马克思地租理论的思考 / 218

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

- 财政学基础理论的理论基础 / 231
公共财政与和谐社会 / 239
马克思国债理论对提高中国宏观调控效果的启示 / 247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金融资产的虚拟价值 / 252
马克思利率理论视角下的银行信贷资金和利率及其政策含义 / 258
从马克思的保险基金理论看保险基金的性质 / 267

马克思主义文化经济学

- 论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共生互动效应 / 273
文化生产力与文化经济 / 279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专论

- 从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和西方企业理论的局限看生态企业理论的构建 / 291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的几点思考 / 302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与西部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 307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是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在当今中国的新发展 / 315
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 321
“三农”问题——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阐释 / 326
用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
——全国首届“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创新”国际研讨会综述 / 335

后记 / 344

总 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①

程恩富^②

过去，人们为了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理性与现实性，往往偏好使用“普遍原理”或“基本原理”来指马克思的某些经济思想，而不愿把这些思想同时也视为一种“理论假设”。在人们看来，似乎理论假设都是脱离实际或无意义的空想和幻想，把马克思的某些经济思想视为理论假设就贬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重要性。实际上，采用“理论假设”及其逻辑叙述方法更有利于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话或论战。严格来说，理论假设同原理或公理是有区别的，但也是可以转化的。在某一经济学理论假设算不算作公理的问题上，渗透着研究主体不同的价值判断和对实证资料的理解。基于不同的方法和立场，即使马克思主义者依据坚实的实证史料和科学的逻辑证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一定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是正确的，但会确认其为理论假设，这将有益于论争的简化和深化。此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某些被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经济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以及属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或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均须在当代中外经济实践中继续进行检验和展开，并使其逻辑体系不断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被认为是某种原理、公理或预见的思想，不妨也可称之为理论假设。

如同现代西方经济学把“生产三要素创造价值论”、“完全自私经济人论”、“资源有限与需要无限论”、“公平与效率高低反向变动论”等视为理论假设一样，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也有必要把“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论”、“利己和利他经济人论”、“资源和需要双约束论”、“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论”等视为理论假设。本文拟在解析经济学假设的内涵和分类的基础上详略不同地阐述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四个理论假设。

一、经济学假设的内涵和分类

假设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环节，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有了前提性假设，才可能有政治经济学自己的演绎过程和逻辑推理。严格说来，假设分为假说与假定两个含义。经济学上所说的假说法，是指以已有的经济事实材料与科学原理为依据，对未知的经济事物或规律性作推测性分析的一种方法。相对科学的经济理论假说，是以现有的经济事实和经济科学知识为依据的，但包含确实可靠与真实性尚未判定的两部分内容，因而具有推测成分，是经济思维接近客观真理的有效方式。经济学假说的验证则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且具有实践的相对性。而经济学上的假定法，则是出于简化等经济研究的方法，在逻辑分析的始点就事

①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②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

先设定某种经济状态的一种方法。不过，经济学的假说和假定时常交织在一起，我们也就可以笼统地用经济理论假设来表达经济思想。

经济学研究能不能随意进行假设呢？任意假设是可以的，但这种假设下的研究及其结论往往是局部的、片面的或错误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科学扬弃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强调学术严谨和贴近现实，不赞成随意假设，因而需要对其进行分类：

第一，根据假设与现实的关系，可分为接近现实的或远离现实的假设。譬如，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假定交易费用为零的“科斯第一定理”，就属于不现实的假设。其道理同假定计划经济的管理费用为零是一样的。

第二，根据假设的科学性程度，可分为较科学的或不科学的假设。以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可否有效结合的假设为例，经验部分已经有力地证明：这一问题的肯定性假设比较科学，而否定性的假设则是不科学的（科斯也承认，关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这一点，现在还不能被证伪）。与“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相比，“生产三要素创造价值假设”显得缺乏科学性和现实性。

第三，根据假设的覆盖面，可分为全面的或片面的假设。如近现代西方经济学包含完全自私和完全理性在内的“经济人”假设，就属于只能解释部分现象的片面假设，由此得出的以偏概全的经济学理论难以被确认为“公理”。同理，“资源有限与需要无限假设”也是片面的。

第四，根据假设的抽象程度，可分为基本的或具体的假设。作为经济学重要方法的唯物史观便属于抽象度极高的基本假设，而马克思关于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一些假设则属于较具体的层面。

假设的不同显示出理论经济学的不同派别和体系。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强调，判断假设的好坏不在于“真实”，而在于建构的理论是否有效，即是否有效地产生了准确的预测；宣称理论的意义越多，假设就越不现实。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则强调假设的现实性、科学性和辩证性，因而具有更大的理论认知功能和社会建设功能。基于上述不同理论假设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这两大理论经济学的方法、范畴、原理和体系既有相互吸收与通约的一面，也有相互批判与排斥的一面，从而呈现为不同的现代理论经济学范式。

二、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

1. “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的要义

依据已有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实践和马克思关于活劳动创造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价值，以及纯粹为商品价值形态转换服务的流通活动不创造价值的科学精神可以推断，凡是直接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这一“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不仅没有否定马克思关于“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的核心思想和方法，而且恰恰是遵循了马克思研究物质生产领域价值创造的思路，并把它扩展到一切社会经济部门后所形成的必然结论。具体说来：

第一，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如为市场提供物质商品的农业、

工业、建筑业、物质技术业等领域中的生产性劳动。这是马克思早已阐明的。

第二，从事有形和无形商品场所变更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如为市场提供货物和人员空间位移的运输劳动，提供书信、消息、电报、电话等各种信息传递的邮电劳动。场所变更或信息传递就是广义交通劳动产生的效用，它们是可以发生在流通领域内的特殊生产性部门。这也是马克思阐明的基本观点。

第三，生产有形和无形精神商品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如为市场提供精神商品的教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化技术、文学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图书馆、博物馆等领域中的生产性劳动，其中包括讲课、表演等无形商品或服务劳动。应当突破价值创造仅限于物质劳动的理念，确认生产有形和无形精神商品的劳动同样创造价值。^①

第四，从事劳动力商品生产的服务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直接涉及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部门，除了包括上述有关人们生活的生产性部门以外，还包括医疗、卫生、体育、保健等。^②

第五，生产性企业私营业主的经营管理活动是创造价值的。中外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承认，在公有制企业内厂长经理从事生产性管理活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生产劳动，而对于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内从事生产性经营管理的活动能不能创造价值的问题则持完全否定或回避的态度。这在分析逻辑上就形成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本来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性管理活动，一旦与该企业的财产私有权相结合，便完全丧失了其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属性。其实，倘若生产性私营企业的主要投资者或所有者同时又是该企业的实际经营管理者，那么，这种管理活动具有两重性：一是从社会劳动协作的必要管理中而产生的劳动职能客观上会创造商品的新价值；二是从财产所有权获利的必要管理中而产生的剥削职能客观上又会无偿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两种职能交织在一起，并由一个人来承担，并不妨碍在科学分析进程中加以定性区别。^③

第六，劳动生产率变化可能引起劳动复杂程度和社会必要劳动量的变化，从而引起商品价值量的变化。马克思在阐述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化规律时舍掉了劳动的主观条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作用，而认定劳动的客观条件和自然条件变动引起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只引起使用价值量变动，不会影响价值总量，所以就得出了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反相变化规律。但是，就一般意义而言，引起劳动生产率变化的重要因素是科技的进步，而它会引致劳动复杂程度、熟练程度和强度的提高，进而增大商品的价值量，并由此增大社会价值总量。^①如果劳动生产率变动是由劳动的客观条件变动而引起的，劳动主观条件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是反向变动关系，这种情况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是存在的。^②如果劳动生产率变动是由劳动的主观条件变动引起的，劳动客观条件没有变动，那么，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是正向变动关系。^③如果劳动生产率变动是由劳动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共同变动引起的，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变动方向不确定，也可能是正方向变动也可能是反方向变动，也可能不变。^④由于劳动的复杂程度、熟练程度和强度的提高而

^① 参见程恩富：《倡导“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光明日报》，2001年7月17日。

^② 参见程恩富：《当代经济研究》，2001年第11期。

^③ 这是马克思没否认而未强调的论断，参见程恩富：《生产性管理活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社会科学》，1995年第7期；《经济管理活动创造价值吗》，《人民日报》，2000年12月14日。

引起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主要的，因而长期来看商品的价值总量和社会价值总量会具有一种向上变动的趋势，而不是不变。我们对马克思的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规律作了如上的界定和新理解，就可以科学地说明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等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与事实。^①

2. 与新假设密不可分的“全要素财富说”和“按贡分配形质说”

与上述“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密切相关的是“全要素财富说”和“按贡分配形质说”。必须指出，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就劳动过程而言，显然，仅有活劳动是远远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拥有除劳动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才能进行现实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提供能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使用价值或效用。其中，包括土地、资本、技术、信息以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等。因而，财富、效用或使用价值的源泉是多元的，是所有或全部相关生产要素直接创造和构成的。同一些论著随意批评马克思经济学忽视财富及其生产要素的观点相反，马克思是一贯高度重视财富及其各种生产要素作用的。

十分明显，这里的“全要素财富说”与“活劳动价值说”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了关于创造商品和财富的完整理论。前者说明的是作为具体劳动过程的生产要素与社会财富（商品使用价值或效用）之间的关系，其目的主要是揭示在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过程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层面上，财富的源泉必然是多元的。后者说明的是作为抽象劳动的活劳动与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其目的主要是揭示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新价值创造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层面上，价值的源泉又必然是一元的。

同时，二者的内在联系又表明：作为劳动主体的活劳动，既是价值的源泉，也是财富的源泉；作为劳动客体的有形或无形生产资料，既是财富的源泉，也是价值创造的必要经济条件或基础。但是，要素价值论者声称财富的源泉就是商品价值的源泉，既然劳动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那么劳动也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其他生产要素同劳动一起共同创造价值。在这里，他们混淆了财富与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劳动过程与价值创造过程等一系列区别。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也必须指出，我国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广义上看，按生产要素分配自然包括按劳动力这一主体性要素分配（在了解了劳动与劳动力的严格区别后，不妨碍我们说劳动是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而市场型按劳分配，首先表明的是要视劳动力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可凭借自身的所有权参与分配，其次才表明要根据劳动力的实际有效支出或贡献，即有效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具体确定可分配的价值量或金额。这不会否定我们经常从狭义上把按劳分配从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独立出来，并分别加以阐明。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生产要素的多种产权状态与生产成果的多种

^① 需要突破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价值量不变的假设与论断，确立科技等劳动的复杂性和熟练性的提高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一般会增大商品价值量这一新观点。详见马艳、程恩富：《马克思“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新探》，《财经研究》，2002年第10期。

分配状态及其相互关系,^① 这启发我们可以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角度提炼出“多产权分配说”, 即多种产权关系决定了按资和按劳等多种分配方式。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其多种分配形式都直接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或产权。^②

事实上, 劳动价值论是一切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石, 所揭示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与商品之间的一般规律以及劳动机制和价值机制, 指出价值是由活劳动创造的, 生产资料的价值只是被转移到商品价值中, 因而使其旧价值得以保存; 而马克思所描述的经典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是没有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经济的, 因而劳动价值论不可能成为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直接依据。不过, 在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中, 劳动价值论同市场型按劳分配有了一定的联系, 因为分配的是商品出售后的价值, 又由企业自主分配并完全货币化。尽管市场化按劳分配的直接依据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制, 但从宽泛的意义上说, 公有制范围内的工资既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 也是市场型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

进一步说, 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表现形式, 是按生产要素所有者在自身创造财富和价值过程中的具体贡献来分配的, 而其经济实质是按生产要素所有者在要素创造财富和活劳动创造价值过程中所贡献或提供的要素数量及其产权关系来分配的。这就是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形式与实质, 用哲学上的形质来表达可简称为“按贡分配形质说”。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生产三要素创造价值假设”把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形式或表象当作其本质, 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既承认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形式或表象, 又揭示了其经济实质, 并在形式与本质相统一的基础上理解和启用“按贡分配”这一术语。这与西方经济学一贯主张按贡献分配的诠释和立场是有本质区别的。

有的论著以为, 只要承认“按贡献分配”的用语, 就等于承认生产要素所有者都亲自创造或贡献了财富和价值, 并据此进行分配。这是有误的论证。其理由在于: 当我们使用“按贡献分配”一词时, 只是承认在特定的经济制度下, 要素所有者拿出了一定数量的土地、资本等非活劳动性质的要素同劳动力相结合, 进而由劳动者运用非活劳动生产要素实际创造财富和价值。从产业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来分析, 要素所有者只是在实际生产财富和价值之前的购买阶段从“预付”、“拿出”或“提供”的意义上“贡献”了非活劳动生产要素, 而所有的财富和价值都是在生产阶段由劳动者运用非活劳动生产要素进行实际创造和生产的, 并在生产阶段结束后(若是商品则在销售阶段结束后), 由购买阶段的各个要素所有者依据“预付”要素的数量及其所有权进行生产成果的分割或分配。可见, 是要素本身成为财富的源泉, 而不是要素所有者成为财富的源泉; 是要素本身对财富的实际构成作出了生产性的贡献, 而非主体性要素所有者对财富的实际构成作出了生产性的贡献; 从一般劳动过程考察, 劳动者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实际生产或贡献出财富或价值, 只与各类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有关, 而同要素的所有权状况(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国家所有或公私混合所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其实, “按贡分配”归根到底可以分解为劳动所得或按劳分配与资本所得或按资分配。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第51章。

②所有权与产权在广义上可以相等。详见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年版, 第74~76页。

当把管理、技术、信息等作为劳动来看待并参与实际分配时，它们属于劳动所得或按劳分配的范畴；当把管理、技术、信息等作为资本来看待并实际参与分配时，它们属于资本所得或按资分配的范畴。例如，科技人员因技术发明而获得收入，属于劳动所得或按劳分配；科技人员再把这项技术发明折合成一定数量的技术股并参与分配，则明显地属于技术资本所得或按资分配。又如，让某个名人在企业挂名并给予一定数量的干股，而他不为该企业从事任何工作，则是将名人的无形资产转化为资本，全部属于资本所得或按资分配。再如，对实际在企业工作的某个管理者或员工实行部分工资加部分干股的总收入分配方式，则其总收入都属于劳动所得或按劳分配。其他生产要素均可作以此类推的分析。

那么，各种要素收益的量的规定是由什么规律和机制进行调节的呢？要素价值论者认为，用边际分析法可准确测定其各自应得的实际贡献额。事实上，各种要素所有者参与分配的量的多少，其依据和分割规律是不同的。工资收入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货币表现，工资的多少并不影响商品的价值，其实际数量多少取决于全体或部分劳动者的谈判和博弈状态，而不是劳动者的边际贡献。^① 非劳动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在竞争规律和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下，等量资本大体获取等量收益，并具体表现为地租、利息和利润等形式。这一趋势性的收益分割规律和机制并不排除各种垄断、产业地位、交易能力和博弈智慧等主观因素影响其实际收益数量。

当前，我们要高度重视和发挥劳动、科技、信息、管理、环境和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切实保障一切要素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促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又好又快地健康发展。这是由“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以及与此有关的“全要素财富说”、“多产权分配说”和“按贡分配形质说”必然推出的政策思想。

三、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

西方经济学自英国近代的亚当·斯密、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以来，一直到当代美国的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布坎南，只把“自私人”即“经济人”作为探究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始点、基点和定点，并由此推演出整个经济学体系和经济进化史。即使现今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传统“经济人”内涵进行修补，把分析范围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增添机会主义行为描述和信息成本约束，或者把含义扩展界定为可用货币衡量的经济利益与不可用货币衡量的精神利益两个层面，也没有根本摆脱作为“最大化行为”的“自私人”的思维模式。这种“完全自私经济人假设”包含三个基本命题：①经济活动中的人是自私的，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策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②经济活动中的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具有完备或较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能视市场和自身状况而使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③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1. “完全自私经济人假设”的误区

正如当代法国经济心理学学会创始人阿尔布在批判西方“经济人的神话”时所说的，

^① 以美国工人为例，1992年工会化雇员得到的平均周工资要比非工会化雇员高35%，而对所有行业的蓝领工人来说，这个比例达70%，但没有证据显示工会化的企业劳动生产率要高于非工会化企业。毛增余主编：《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顾海良、王振中、林岗、程恩富》（第5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各门人文科学的进步，尤其是心理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进步，使我们不难证明有关“经济人”的这些论点是不够的或不确切的。具体说来，“完全自私经济人假设”或“完全利己经济人假设”的理念存在下列误点：

其一，理念源于功利主义。19世纪，边沁将大小私有者在经济活动中自发产生的功利标准泛推到伦理领域，把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私精神说成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途径。这是亚当·斯密经济学及其后继者的主要哲学方法。其实，休谟早就批判过类似观念，他写道：“自私这个性质被渲染得太过火了，而且有些哲学家们所乐于尽情描写的人类的自私，就像我们在童话和小说中所遇到的任何有关妖怪的记载一样荒诞不经，与自然离得太远了。”^①

其二，理念同预设主义相吻合。现代科学哲学的预设主义认为，在科学发展中，存在某种预设的、超历史的、不变的、不可违背的方法、基本假设、推理原则和“元科学”概念。而“完全自私经济人”理论恰恰强调，不管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是不是完全自私的，经济学必须以理性的“自私人”为不变的假设或预设，这是不可违背的分析方法和推理原则。奥地利的经济哲学家米塞斯在《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一书中，就完全排斥经验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及实证主义方法，反对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关于经济学是说明个别性的历史科学这一观点，而宣称经济学是以原子式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规律化的先验理论，“先验的理论并不是来自经验”。^②显然，这又沿袭了康德先验论的思维方法。

其三，理念的历史唯心论底蕴。“旧经济人”理念视利己心是与生俱来和一成不变的东西，不分历史时点地把“自私人”抽象化、永恒化和绝对化，无视特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对人的经济行为与经济心理的作用，这就有意或无意地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连杜威也不赞同，他说：“事实上，经济制度与关系乃是人性中最易改变的表现方式。历史便是其变化幅度的活生生的证据。……如果人性是不可改变的，那么就不存在教育这类事情，我们从事教育的全部努力就注定会失败。”^③

其四，理念渗透着形而上学的偏见。当代西方私有产权学派代表人物张五常曾经透彻地表达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信念：“经济学上最重要的基本假设是：每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在局限约束条件下争取他个人最大利益。说得不雅一点，即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一贯地、永远不变地以自私为出发点。……在经济学的范畴内，对任何行为都是这样看：捐钱、协助他人、上街行动等，都是以‘自私’为出发点。”^④略懂唯物辩证法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大概均不会首肯此类极端片面的、孤立的和静止的理性“自私人”观点。博兰在1997年出版的《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中这样评论：“新古典经济学醉心于下述形而上学观点，即每一位个别决策者都是理性的（至少在个人的行为能用理性的论据加以解释的程度上）。令人遗憾的是，当理性和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时，就会产生一种颇为机械的关于决策行为的观点——也就是个人被视为一台机器。”^⑤

① 休谟：《人性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27页。

② 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③ 杜威：《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④ 转引自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⑤ 劳伦斯·A·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230页。

其五，理念存有“经济—道德”二元悖论。斯密在《国富论》中只确认经济领域的自私自利行为，而在《道德情操论》中又确认道德领域的人可能有某些同情心和利他行为，这似乎形成一个“经济—道德”二元悖论。难道经济活动过程中没有道德和利他问题？完全和永恒的“自私人”与“道德人”或“利他人”行为如何协调？与西方经济学家一般因谈不清而不敢谈经济行为的道德问题不同，贝克尔撇开这一难题，承认在家庭和亲戚范围内有程度不一的利他行为，即主张“血亲利他主义”。但不管怎样，只要在经验或实践中存在利他行为（含家庭经济活动），完全的“天性利己主义”假说就被证伪了。诚然，“血亲利他主义”也解不开“经济—道德”二元悖论的矛盾死结，因为它只是放宽了家庭这一领域的分析，非家庭的广大领域依然笼罩着“自私人”思维。

其六，理念奉行唯理论的教条。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说的理性，是指个人谋求自身私利的合理行为，因而“理性人”也就是“自私人”，甚至合称“理性经济人”。在他们的视野里，人若不自私那就属于非理性。这可称为“自私拜物教”，是极端片面和夸大理性作用的观点。经验表明，自私不等于理性；某些自私行为属于非理性，如因故一时冲动而签订私人经济合同；某些理性行为属于利他，如有些匿名捐款。事实上，弗洛伊德主义及其心理实验也可印证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比“完全理性”或“充分理性”假说要贴近现实。不过，“有限理性”假说仍是在旧“自私人”理论框架内的改良，没有本质上的创新，因为这一理论改良也无法阐明“抢银行是不是理性的”（博兰的问题），以及“盗窃何害之有”（张五常的主张）等逻辑怪题。

其七，理念崇尚人类低级本能的意识。个人的本能或人类的本能是一切动物所共有的，是由生理决定的。而个人的本性或人类的本性则是由特定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旧“经济人”理论却用个人的低级本能及其经济行为与经济心理替代人的多样化社会本性，形成思维的单一性和呆板性。美国的凯里曾愤怒地指责：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实际上不是人，而是受最盲目的情绪驱策的想象的动物”，“他们的理论，讨论人性的最低级本能，却把人的最高尚利益看作是纯属干扰其理论体系的东西”，因而亵渎了大写的“人”字。^① 弗洛姆甚至把接纳倾向型、剥削倾向型、贮藏倾向型和市场倾向型的人格归于病态，而只把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且不以损人利己来达到自己目的的生产倾向型人格，称作真正健康的人格。即使参照弗洛伊德关于“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划分，也不能将天生的、原始的、本能的“本我”等同于道德的、高级的、超个人的“超我”，旧“自私人”理念只相当于“本我”层次和根据一般现实原则行事的理性“自我”层次。

其八，理念局限于“店老板”的狭隘思维和人性异化心理。在近代，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的经济和哲学思想具有反封建和反禁欲的积极效应，但属于资产阶级缺乏学术严谨性的意识之一。德国历史学派的李斯特在抨击斯密“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及其理论体系时就尖锐地指出：“这个学说是以店老板的观点来考虑一切问题的”，“完全否认了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存在，一切都要听任个人安排”，“利己性格抬高到一切效力的创造者的地位”。^② 该学派认为，客观存在着三种现实人的行为：一是在私人的经济中，一切以个人利益为转移；

^① 转引自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页。

^② 转引自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页。